

第三章 花蓮巴黎外方教會來台傳教歷史

西班牙道明會會士，傳教的區域首先在台灣的北部、基隆、淡水一帶，並在社寮島上興建教堂和房子。1642年，佔據台灣南部的荷蘭人揮軍北上，西班牙被迫放棄在台傳教事業，天主教便在台灣中斷傳教約兩百年，西

班牙據台16年間，約有4千多位教友，無穩固的教務基礎，與目前台灣地區的天主教並無實質直接關聯性。

台灣天主教發展的開端，拜1858年（清咸豐八年），清廷戰敗與西方列強簽訂天津條約，恢復外籍傳教士在台灣傳教自由，天主教再重入台灣。1895年日本侵台，日本人對宗教採放任態度，天主教教務發展進行未受阻礙。日本治理初期台灣歸廈門教區管轄，1913年7月才成立台安監牧區，林牧才（Clemente Fernandez,O.P.）擔任首任監牧。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道明會在台傳教已建立非常穩固教務基礎，直至二次世界大戰點燃戰火，日本當局下令教會與外國斷絕關係，集中教友於嘉義地區看管，傳教工作受到限制。

1944年台灣光復，天主教在台灣教務才開始成長，隨著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政治因素配合及大陸教友遷徙來台，原住民大量入教，大批原在大陸傳教的神職人員受共產黨迫害來台，促使台灣天主教教務快速成長，1952年教廷宣佈台灣為中國聖統體制之下第21個教省，讓台灣自光復前的邊緣地區一躍成為中樞地位

第一節 天主教巴黎外方教會歷史

巴黎外方傳教會(法語：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拉丁語：Societas Parisiensis missionum ad exterarum gentes))創始於1660年為法國天主教的男性使徒生活團，創辦人為安南（越南）的兩位神父，一為東京（越南北部）的方主教(Fr.Pallu)，另一位為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主教郎伯爾(Lambert de la Motte)。當時這兩位主教還分別署理中國西部與南部的教務，朗主教一生都沒到過中國，方主教則1680年受命為全中國的署理主教。為培植傳教士，兩位主教於1660年在巴黎附近開設一間專為赴中國、越南等地傳教的修會，1663年遷址到巴黎的巴克路，直到現在，該地為外方傳教會的大本營。梵諦岡在1664年的8月10日批准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成立，它與傳統的天主教修會不同，是歷史上最早的全力從事海外傳教的天主教組織。巴黎傳教會的創立，目的就是傾整個修會的全力到外方進行傳教工作，之後許多天主教國家都有外方傳教會的成立，譬如：瑞士的白冷外方傳教會等。

巴黎外方傳教會主要在亞洲從事傳教工作，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國、韓國、日本、台灣、香港等地。歷史上，中國的西南地區、兩廣和東北，乃至西藏的邊緣地帶，都是巴黎外方傳教會重要的傳教區。巴黎外方傳教會於1680年到達中國福建省，禁教時期在四川省堅持秘密傳教，此後在中國陸續開闢的教區有：成都教區、瀋陽教區（1840年）、康定教區（1846年）、重慶教區（1856年）、廣州教區（1858年）、寧遠教區（西昌）、敘府教區（宜賓）、貴陽教區、昆明教區、南寧教區（1875年）、吉林教區（1898年）、汕頭教區（1914年）、北海教區（1920年）、安龍教區等14個。在中國殉道而死的傳教士有徐德新主教（Gabriele Taurin Dufresse）、馬賴神父（Augusto Chapdelaine）、文乃爾神父（Giovanni Pietro Neel）等多人。

1952年，教廷成立花蓮監牧區，委託給巴黎外方傳教會負責，並由曾在東北傳教的營口費聲遠主教擔任署理職務，展開巴黎外方教會62年47位傳教士在花蓮傳教耕耘的歷史。



位於巴黎的巴克路的外方傳教會外觀



1876年巴黎外方傳教士身穿長袍馬褂的合影

第二節 花蓮巴黎外方教會花蓮傳教歷史

1951-1952 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年度彙報文中，有段記錄「1951 年為本會在中國的 14 個傳教區是個冗長而痛苦的加爾瓦略山。本會三百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會友被逐出」。在所謂『解放中國』放逐會友的時刻。本會在台灣接受委託，創辦一處新傳教會，由增在東北營口主教費聲遠出任署理主教。

記錄很正確，沒有一個字可刪改。但是 對這樣重要的新聞，這報導未免太簡略草率。

費聲遠：回憶錄·51

1951 年是天主教在花蓮發展的重要關鍵年，這一年費聲遠主教遭大陸區離離，輾轉來到台灣的一年，在台灣四處參觀遊覽，眼見東部原住民的天真純樸後，毅然決定在花蓮成立新教區，開創天主教在花蓮嶄新的一頁，肇始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來花蓮傳教歷史。

一·從大陸到花蓮

歷史的可貴在於它的發展非你我可操控，無論是為了什麼理由奮鬥，努力要達成的目標，往往承受不住突發事件的衝擊，政局的演變卻是這歷史過程中最大的變數及力量。武力的侵略，讓一切的苦難會加諸在人民的肉體與精神，如此 人就必須靠著精神的慰藉，在天主教花蓮教區的發展上，可略為印證這層演變。當西方傳教士往東方傳教，人口數眾多的中國大陸，不用考慮，絕對是傳教的首選之地，一定是原始的奮鬥目標，大陸的赤化，共產主義的無神論，讓天主教會飽受中共當局的打壓，天主教會士及修女們，開始自香港輾轉來到台灣，展開他們的傳教事業，尤其 大陸東北地區傳教的費聲遠主教來到台灣，無疑地 他就是天主教在花蓮發展的歷史關鍵人物。

原在大陸東北地區營口主教費聲遠，1951 遭大陸驅離，經由香港至台灣，成為天主教在花蓮發展的最大契機。費主教未來花蓮前，其教務由台北總主教選派道明會的神父及 8 位聖母聖心修會的修女們(Pablo Fernandez O.P 著、黃德寬譯，1991) 在花蓮北濱街與田埔兩處設教服務。在費聲遠主教來台灣，為了慰問聖母聖心修會的修女來到花蓮，初次拜訪花蓮的他，當下就決定留在花蓮傳教，他的

回憶錄上寫著：

在這廣闊的土地上，竟然沒有一座教堂，看不到十字架的影子，散居在山谷海邊的山地人（現稱為原住民），數目達幾十萬之多，竟沒有人為他講解天主的道理，領導他們認識與崇拜天主。鑑於斯，思於斯，我的心血沸騰，由觀光客的我立刻恢復到傳教士的身份了，不禁大聲叫道：這就是我的工作，不必到別處另找了。（費聲遠，1980）

費聲遠主教的努力下，教廷 1952 年在花蓮成立新的教區，將原屬台北教區的花蓮，與原屬高雄教區的台東合併成為花蓮教區，同時，由巴黎外方教會負責花蓮地區的傳教工作，瑞士白冷外方傳教會負責台東地區的傳教工作。

1955 年天主教會花蓮教區正式獲得臺灣省政府民政廳許可成立財團法人天主教花蓮教區，成立的目的為：

- （一）供應本教區為舉行天主教儀式及宣揚天主教義所需一切設備及經費。
- （二）供應本教區已辦或擬辦之教育、慈善、社會公益等事業或教會團體、團員或某一地區居民之福利事業所需用之一切設備之經費。

目前花蓮教區的主教為黃兆明（2001.1.11 月 21 日迄今），1998 年 5 月 22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卑南族的曾建次神父擔任花蓮教區輔理主教，同年 8 月 29 日正式就職，成為第一位原住民族籍的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台灣區會長為呂約伯會長，同時也是目前民國路天主堂的第四任本堂神父。

二·花蓮的台灣奇蹟

1962 年，費聲遠主教在花蓮成立新教區剛好 10 年，10 年間，花蓮教區成立 43 個堂區，3 萬 5 千以上領洗教友及 2 萬以上墓道友，大多數是原住民，費聲遠主教期間，一共落成 1 百座以上的大小教堂，讓他享有「建築師主教」的綽號。信徒的成長速率是台灣其他教區（49.83%）所不能比擬（瞿海源，1981；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合著，2005）。

分析花蓮天主教的十年台灣奇蹟，民眾大規模的信奉天主教有下列原因（瞿海源，1981；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合著，2005；費聲遠，1970）：

(一) 新教友（原住民）：因為山地生態環境改變，讓原有的宗教無法有效地遂行其應有的功能，原住民純樸性格，傳教士的親和態度，讓他們能夠接受外教。

(二) 真實需要：當時正值二次大戰結束，物質缺乏，精神和物質的空虛，讓人自然的將心轉到精神層面的需求，天主教的傳入正好滿足當下精神的需求。

(三) 開拓精神：傳教士大多已在大陸傳過教，也蹲過中共的牢房，因此山區的生活環境困難，能吃苦及深入民間，學習語言融入當地生活，與當地民眾生活在一起。

(四) 政府協助：台灣光復後，政府在基本政策與態度上，充分維護宗教自由的原則，也因天主教與政府官員的政治立場或價值取向上，彼此的雷同性質近，雙方的關係和諧，使得傳教事業上獲得實質的幫助。

天主教發展於 1970 年代後成長幅度呈現緩慢，依費聲遠主教回憶錄所記載，有人把將花蓮天主教發展區分成三期：（費聲遠，1980）

第一時期（1953-1960）奇蹟時期：原住民大批歸主，新傳教士來分擔工作、劃分工作、劃分區域，成立堂區及會所。

第二時期（1961-1967）鞏固時期：舊有的木造建築都改為水泥的新建築，最後一批望教友受洗，組織青年加入傳教工作，鞏固已受洗的教友的宗教意識。

第三時期（1968-1975）垂暮時期：剩餘的望教友表現欠佳，受洗教友熱心衰退，青年離家外出工作，至台北、高雄等大都市謀生活。

因整個環境的變遷，導致整個教友的流失，費主教感嘆嗚呼，面對這現象，他提到：

且不談論這惱人的「式微」是什麼？凡是同我們生活於斯，親眼目睹近年來一切快速的改變，更體察到物質、工業、經濟、文化及教育的進步，就能預料這式微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雖我們最好教友都居住在僻靜的鄉野，受不了都市

的誘惑，可是，一旦交通發達，距離縮短，行動便利與外界接觸日益頻繁，都市的繁華吸引力倍增，在求新求變的心理激勵下，這群教友逐漸「文明」起來，他們原先純樸，溫順可愛逐漸減少。（費聲遠，1980）

我們最大的敵人，按我的意思是電視。這樣說也許會激起許多人的驚愕。請放心，我無意批評節目的道德性及教育性。……那是電視機的妄用。觀眾，我們在山野的教友以不例外、都毫無節制地，出神忘形注視電視機，把對天主的責任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費聲遠，1980）

事實上，費主教在回憶錄中感嘆的式微情況，教友的流失，以及教友日趨冷淡，之後並未有太大改善。1980年代後，經濟快速起飛，台灣步入工業社會，工廠林立，大批人口自鄉下遷至都市，導致部落多是老人與小孩。而社會價值的改變，物質主義的興起，讓過去單純的部落環境讓更多的元素進入。費主教室為當時的天主教的敵人-電視，現在都擁有更大的能力（power）吸引原住民的教友，台灣天主教的發展與台灣社會世俗化的傾向有緊密的關聯。當世俗化轉弱時，就是教勢興盛之際，世俗化增強時，天主教就會碰到發展的困難，天主教與電視的競爭，其實就是世俗化與非世俗化的衝突（瞿海源，1981）。